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分析*

陈文超 陈 雯 江立华

【摘要】文章通过对2 949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1)年龄和教育对农民工创业行动的影响并不呈线性关系;中年人及拥有中等文化水平的农民工比其他年龄阶段或其他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更容易选择返乡创业。(2)与市场利益、政策刺激和地位获得等因素相比,家庭因素对个体返乡创业的影响更为突出。(3)当社会扶助力度较小时,优惠的政策难以成为刺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因素;当政府扶助力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才会真正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因此文章认为,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出发,应该制定以中年和中等受教育水平的农民工为对象,以家庭发展和稳定为核心的政策,并不断深化政策的实施力度,而非简单完善政策内容。

【关键词】农民工 返乡创业 影响因素

【作者】陈文超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陈雯 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立华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一、问题提出与理论背景

目前农民工的经济行动类型已不再局限于“种地”和“外出打工”,随着经验和资本的积累,“返乡创业”也成为他们的一种经济行动选择。在实践中,这一经济行动也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不仅有助于维持社会、市场稳定(崔传义,2004:385),还可以成为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策略和手段(Barbieri,2001)。因此,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出发,探讨哪些因素能够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成为统筹城乡劳动就业格局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纵观国内外关于自主创业选择的研究文献,从创业行动的功能论到创业行动的社会网络论,从创业行动的策略论到个体的社会心理的解释,大致可以归纳为“市场收益论”、“政策刺激论”、“地位获得论”和“家庭需求论”4种类型。

从经济行动的“经济取向”维度进行分析,大量来自美国、加拿大和德国的研究证明了高收入与创业之间的正相关关系(Bernhardt,1994;Spener等,1999;McManus,2000;Lofstrom,2004)。因此,“市场收益论”认为,收入因素是解释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一个重要变量。

从制度结构出发,诸多学者关注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对个体自雇型创业经济效益的刺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返乡农民工创业行动研究”(11CSH004)的阶段性成果。

激(Robson等,1999;Robles等,2007),并相信国家政策调整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有显著的影响(崔传义,2004:385)。这部分研究强调“政策刺激”,认为政府应协调和配置资源,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给予政策上的倾斜(村上直树,2010;程春庭,2001;林斐,2001)。

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探讨,一部分学者延伸出对“自雇型创业是劳动力市场中有效避免不公正待遇”(Light,1972)和“职业发展安全性和稳定性”(Hinrichs,1990)方式的论述,并认为创业是个体将不利条件转化为优势资源(Brettell等,2007)的途径。由此而产生“地位获得论”,强调个体可以通过创业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并将进入市场创业视为一种向上流动的路径(Bates,1997;Waldinger等,1990:13~48)。因此,他们认为农民、移民、老人等受教育程度较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不足的个体更倾向于选择自主创业(Quinn,1980;Vijverberg,1990;Mata等,1999)。

从时间分配维度出发,创业行动在弹性时间安排上的灵活性(Boden,1999),以及在避免照顾家庭与失业风险二元矛盾方面的优越性,使部分学者强调创业与家庭之间的天然关系(韩俊,2009:194),认为创业是既可以完成家庭中照顾老人、孩子的责任和义务(Boyd,1991),又可以增加工作时间的一种自然选择。由此派生出以“家庭需求”为导向和解释维度的创业行动分析。

上述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政策刺激、地位获得和家庭需求均会对个体的创业选择产生影响,但这些观点是否切合中国事实?究竟是何种因素对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最具影响力?本文将以此为核心议题,比较和探讨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键性因素。

二、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 数据来源及分布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2012年“返乡农民工创业调查”个体层面的原始数据。该调查共发放问卷35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49份,有效率为84%。被调查者户籍所在地区分布为四川(133)、河南(400)、湖南(323)、安徽(171)、湖北(497)、河北(188)、山东(262)、江西(267)、重庆(65)、广东(9)、广西(112)、贵州(18)、宁夏(32)、云南(16)、甘肃(12)、江苏(83)、浙江(110)、福建(33)、辽宁(14)、黑龙江(1)、海南(16)、天津(23)、北京(5)、山西(55)、内蒙古(30)、陕西(74)。调查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二) 变量及模型选择

本文主要研究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基于整理过的数据,本文主要使用Logistic模型,一方面针对因变量为“是否创业”的行动做二分变量的Logistic回归,比较市场收益、政策刺激、地位获得、家庭需求对促进农民工创业行动的影响,进而与西方和以往研究对比,寻找到符合中国特色的实情。其中1代表“创业”,0代表“不创业”。根据以往研究结果并结合调查问卷的实际情况,选取5个方面:(1)个体性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2)市场收益因素:经济收益追求程度;(3)地位获得因素:对社会地位的追求度;(4)政策刺激因素:政策扶助度;(5)家庭需求因素:是否有孩子。以此分析在不同因素影响下,农民工选择创业

表1 农民工返乡创业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2949)

| 自变量 | 样本量 | 百分比 | | 自变量 | 样本量 | 百分比 | |
|-------|------|-------|-------|---------|------|-------|-------|
| | | 创业者 | 非创业者 | | | 创业者 | 非创业者 |
| 年龄(岁) | | | | 没有 | 1410 | 28.14 | 71.86 |
| 15~34 | 1995 | 16.19 | 83.81 | 经济收益追求度 | | | |
| 35~54 | 901 | 30.19 | 69.81 | 不迫切 | 32 | 15.63 | 84.38 |
| 55~64 | 47 | 10.64 | 89.36 | 比较不迫切 | 284 | 19.01 | 80.99 |
| 65+ | 6 | 33.33 | 66.67 | 一般 | 586 | 16.55 | 83.45 |
| 受教育程度 | | | | 比较迫切 | 1273 | 20.82 | 79.18 |
| 小学及以下 | 348 | 18.97 | 81.03 | 非常迫切 | 774 | 23.39 | 76.61 |
| 初中和高中 | 1749 | 23.09 | 76.91 | 社会地位追求度 | | | |
| 高中以上 | 852 | 15.51 | 84.49 | 不迫切 | 146 | 19.18 | 80.82 |
| 政治面貌 | | | | 比较不迫切 | 109 | 17.43 | 82.57 |
| 党员 | 237 | 21.94 | 78.06 | 一般 | 800 | 18.75 | 81.25 |
| 非党员 | 2712 | 19.57 | 80.43 | 比较迫切 | 828 | 21.01 | 78.99 |
| 性别 | | | | 非常迫切 | 1066 | 21.67 | 78.33 |
| 男 | 1772 | 24.04 | 75.96 | 未来的计划 | | | |
| 女 | 1177 | 14.95 | 85.05 | 回乡 | 2179 | 20.20 | 79.80 |
| 是否有小孩 | | | | 外乡 | 770 | 22.65 | 77.35 |
| 有 | 1539 | 11.99 | 88.01 | | | | |

注:年龄均值为31.18,标准差为10.08;受教育年限均值为10.65,标准差为3.19;获社会扶助程度均值为6.58,标准差为5.81。

的概率。其中“政策刺激”效果通过政策扶助度来表现。该变量是一个连续变量,是通过对被访者所享受到的各项优惠政策,以及其所获得的社会各界的帮助程度进行评分,从而得出农民工所获得的综合政策扶助度。另一方面延用上一个模型的解释变量,使用多分类的Logistic模型估计在各类因素影响下,农民工经济行动类型选择上的差异,进而寻找到政策制定的依据与着力点。本文的因变量是根据“是否创业”和“是否回乡”的两个二分类变量组合而成的4种经济行动类型:(1)回乡创业;(2)回乡种地;(3)外乡创业;(4)外乡打工^①。

三、数据分析

(一) 创业行动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1. 个体性因素对创业行动选择的影响

从性别来看,与以往研究结论相同,表2数据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选择自主创业。

^①“回乡创业”指回到家乡所在地,包括农村(老家)、与家乡较近的乡镇、县城及市进行创业;“外乡创业”指在相对于家乡较远的地方,如在除所属省份之外的城市进行创业经济活动。“回乡非创业”指回到家乡及与家乡较近的城镇之中从事非创业经济活动;“外乡非创业”主要指在离家乡较远的(如在所属省份之外)地方从事非创业经济活动(如受雇等)。

与女性相比,男性选择创业行动的发生比高出 73% ($e^{0.550}-1, p<0.001$)。性别方面的特征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大体相同,而在年龄和教育方面,本文发现了与以前研究不同之处。

从年龄层面来看,以往的研究在年龄对个体创业行动的影响方向上存在争议,一类研究认为在自雇创业过程中,工作时间和薪水有着较大的弹性并且可以自行规

划和决定。因此,年龄越大的个体越倾向于选择自雇创业(Quinn, 1980)。另一类研究认为职业变迁对于他们而言风险更大,所以年龄越大,创业的可能性越小(Gerber, 2001; Rona-Tas, 1994; 吴晓刚, 2006)。在模型 1 中,年龄对创业行动的选择并没有影响,然而加入平方项后,年龄对选择创业行动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并且从年龄和年龄平方项系数的显著性来看,年龄对“是否选择创业”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的关系,农民工选择创业的概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先上升后下降。根据模型 3 计算,拐点约为 39 岁,即 39 岁以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选择创业的可能性不断升高,而 39 岁以后选择创业的概率开始下降。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发现,年龄对农民工创业行动的影响不能用线性关系去理解。从青年阶段进入到中年阶段时,更加符合 Quinn(1980)的研究结果,然而当个体从中年期进入到老年期后,更加符合吴晓刚(2006)的研究结果。因此,本文认为从年龄因素来预测农民工的创业行动需要分阶段进行。

从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来看,教育对农民工选择创业的影响也呈非线性关系。当受教育年限达到 11 年左右时,农民工选择创业的概率最高,随后选择创业的概率开始下降。以往研究一方面认为教育水平低是进入市场创业的障碍(Boyd, 1991; Li, 2001),另一方面又认为创业是为低教育水平等一些资源条件较少的个体获得社会地位提升的途径(Quinn, 1980;

表 2 以创业行动选择为因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 (n=2949)

| | 模型 1 | 模型 2 | 模型 3 |
|-----------------------|-------------------|-------------------|-------------------|
| 性别 | 0.542*** (0.101) | 0.530*** (0.102) | 0.550*** (0.103) |
| 年龄 | 0.010 (0.006) | 0.296*** (0.045) | 0.298*** (0.045) |
| 年龄的平方项 | — | -0.004*** (0.001) | -0.004*** (0.001) |
| 受教育年限 | 0.030 (0.016) | 0.339*** (0.089) | 0.337*** (0.089) |
| 受教育年限的平方项 | — | -0.015*** (0.004) | -0.015*** (0.004) |
| 政策扶助度 | -0.001 (0.009) | -0.001 (0.009) | -0.114*** (0.028) |
| 政策扶助度的平方项 | — | — | 0.004*** (0.001) |
| 社会地位追求度 | 0.055 (0.044) | 0.053 (0.044) | 0.053 (0.044) |
| 对收入的关注度 | 0.012 (0.052) | -0.015 (0.052) | -0.019 (0.052) |
| 有孩子 | 0.959*** (0.136) | 0.436** (0.153) | 0.429** (0.153) |
| 常数项 | -3.179*** (0.375) | -9.161*** (0.952) | -8.588*** (0.961) |
| Pseudo R ² | 0.054 | 0.074 | 0.081 |
| Log likelihood | -1411.298 | -1381.691 | -1371.759 |

注:将受教育程度作为虚拟变量的模型和将受教育程度作为连续变量的模型相比,限制条件显著减少了似然率($p=0.0040$),因此接受未限制模型,将受教育程度作为连续变量,转化为受教育年限。另外将“社会地位追求度”和“对收入的关注度”当中虚拟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时,比较结果均不显著,且似然率检验显示,现实条件显著减少了似然率($p=0.0000$),因此选择未受限制的模型。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差。*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01$ 。

Vijverberg, 1990; Mata 等, 1999)。从数据结果来看^①, 受教育程度很低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选择创业的可能性均较低。就中国而言, 一方面由于市场门槛日益增高, 受教育程度过低的农民工因缺乏一定的知识和市场意识, 很难通过创业的形式进入市场, 另一方面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民工, 与仅受过初高中教育的农民工相比, 由于他们拥有更多的人力资本, 因而很容易通过非创业的途径获得相应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报酬。在这种情况下, 拥有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非创业的经济行动中去, 而无需创业。简而言之, 具有较大创业可能性的农民工集中在教育水平居中的这部分人群当中。

2. 政府、市场、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创业行动选择的影响

从“政策刺激论”来看, 政府所预期的效果是优惠政策的推行, 以及推动社会扶助与服务会增加农民工选择创业的概率, 并以此引导农民工的创业行动。然而, 从模型 1 和模型 2 的结果不难看出, 得到社会扶助与优惠政策对农民工的创业行动没有显著性影响。通过加入二次项发现, 回归系数开始具有显著性, 农民工所获得的社会扶助度与是否成为创业者之间呈现出非线性的关系。当扶助力度达到中等水平之前, 农民工获得社会扶助的程度越高, 他们选择创业的可能性反而不断降低; 当扶助度超过中等水平之后, 农民工从事创业行动的可能性才开始增高。也就是说, 简单的社会扶助, 并不能刺激农民工选择创业活动, 相反还会降低其创业的积极性。只有当社会扶助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政策激励效果才能显现。

与此同时, 在本文模型数据结果当中, 农民工对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的关注度对是否选择创业并没有显著影响。相反, 是否“有孩子”对是否选择创业行动具有显著影响, 并且与没有孩子的农民工相比, 有孩子的农民工选择从事创业活动的发生比更高。从模型 3 的结果看, 与没有孩子的农民工相比, 有孩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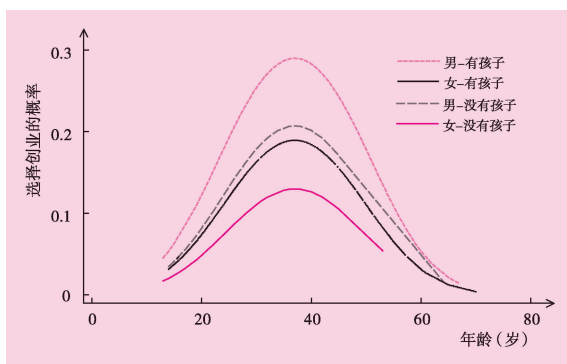


图 1 分年龄分性别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农民工在选择创业行动上的差异

注: 以本文所用的原始数据为基础计算并绘制, 图形曲线进行过平滑处理。

农民工选择创业行动的发生比高出 53% ($e^{0.429}-1, p<0.01$), 是没有孩子的农民工的 1.5 倍。通过图 1 不难看出其中的差异。就性别差异来看, 男性创业的概率普遍高于女性。在同一性别当中, 有孩子的农民工比没有孩子的农民工选择创业的可能性高。因此, 有理由相信有孩子的农民工比没有孩子的农民工更容易成为创业者。

从现实情况来看, 一方面, 随着中国市场逐步完善, 市场对参与其中的个体所具备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要求越来越

^① 将受教育年限转化为分类变量后, 拥有“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与“没有上过学”的农民工选择创业的概率基本相同($p=0.074$)。

高。农民工作为这些资本存量较低的社会弱势个体，难以与其他拥有较多资本存量的个体竞争。因此，当农民工转向市场创业行动时，大多不会抱着竞争及获胜的目的；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劳动生产过程中需要追求经济、生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他们会通过改变劳动量在不同环节的投入来保证稳定。作为保证生活稳定的一个重要环节，家庭需要有所偏重。而返乡创业正是平衡家庭生活与劳动生产的一种经济行动方式。因此，市场收益和地位获得均难以成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核心影响因素。在农民工看来，返乡创业只可能是“一个穷人的避难所”，而不是“一条通往财富的道路”(Hanley, 2000)。有理由相信，在农民工选择是否创业的过程中，来自对市场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追求的目的性极小。由此可知，在中国情境下，农民工的创业行动选择并非来自对经济收益的追求。农民工对追求社会地位的迫切程度并不影响其创业选择，也可以说农民工创业行动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来自个体对社会地位的追求。

(二) 地域的选择与政策效果预测

多分类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可以分析在不同因素影响下，农民工选择经济行动类型的变化，以及在不同条件下农民工所倾向的选择类型。表 3 反映了市场利益、地位获得、政策刺激和家庭需求影响下农民工对经济行动类型的选择。

1. 市场因素影响下农民工经济行动类型的偏好

从外部因素的角度来看，前文已经发现“市场收益”并不能直接导致农民工选择创业。表 3 的结果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结论：相对于打工而言，农民工对收入的关注度每增加 1 个单位，选择“回乡种地”的发生比增加 13%，选择“外乡创业”的发生比增加 23%，而选择“回乡创业”与“打工”并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当农民工放弃打工时，如果他们为了追求更多的经济收入，那

么其经济行动通常会指向“外乡创业”或者“回乡种地”，而不是返乡创业。对追求社会地位则体现在“打工”方面，数据显示，相对于选择外地从事非创业经济活动者，选择“种地”的农民工，对社会地位的追求程度每增加 1

表 3 农民工经济行动地域选择的多类别 Logistic 模型 (n=2949)

| 变 量 | 回乡创业 | 外乡创业 | 回乡种地 |
|-----------------------|-------------------|-------------------|------------------|
| 性别 | 0.540*** (0.143) | 0.634*** (0.192) | 0.028 (0.101) |
| 年龄 | 0.204** (0.063) | 0.287** (0.095) | -0.105* (0.045) |
| 年龄的平方项 | -0.002** (0.001) | -0.004** (0.001) | 0.002* (0.001) |
| 受教育年限 | 0.474*** (0.130) | 0.086 (0.143) | 0.042 (0.080) |
| 受教育年限的平方项 | -0.028*** (0.006) | -0.006 (0.006) | -0.009** (0.003) |
| 政策帮助度 | -0.192*** (0.043) | -0.125* (0.056) | -0.077* (0.037) |
| 政策帮助度的平方项 | 0.007*** (0.002) | 0.004* (0.002) | 0.002 (0.001) |
| 社会地位追求度 | -0.054 (0.063) | 0.055 (0.086) | -0.096* (0.047) |
| 对收入的关注度 | 0.024 (0.072) | 0.209* (0.099) | 0.124* (0.053) |
| 有孩子 | 0.866*** (0.218) | 0.681* (0.270) | 0.508** (0.158) |
| 常数项 | -5.495*** (1.347) | -7.135*** (1.848) | 3.610*** (0.912) |
| Pseudo R ² | 0.112 | Log likelihood | -2828.181 |

注：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差。*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01。“外乡非创业或外出打工”为参照组。

个单位,发生比降低 10%。简而言之,如果农民工希望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更加可能选择外出打工,而非在家“种地”或回乡创业。这与西方研究中认为个体选择创业是出于经济利益或追求社会地位的结论(Bernhardt, 1994)有细微的差异。因此,从政策效果来看,在中国,如果以市场利益作为引导因素,通常最后会产生农民工在外乡创业或回家种地的结果,而以社会地位的获得为诱导因素,则可能使农民工依然保持打工者的身份。

2. 政策刺激下农民工经济行动类型选择倾向

优惠政策的出台是否会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呢? 通常情况下我们认为,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政策优惠,以及社会团体的支持可以让他们提高技术和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因而他们将更加愿意返回家乡创业。从当前的政策效果来看,当政府帮助程度中等偏下时,“种地”的发生比最高(见图 2)。此时政策和社会帮助对刺激农民工返乡创业、外出打工和在外地创业的影响都很微弱。当农民工所能享受到政策性优惠和帮助程度指标达到 20 时,即个体能够享受较大范围的政策时,此时选择返乡创业发生概率迅速提升。然而,就本文的调查对象的总体情况而言,政策帮助度的众数为 7,均值为 9。无论从哪个层面进行分析,目前农民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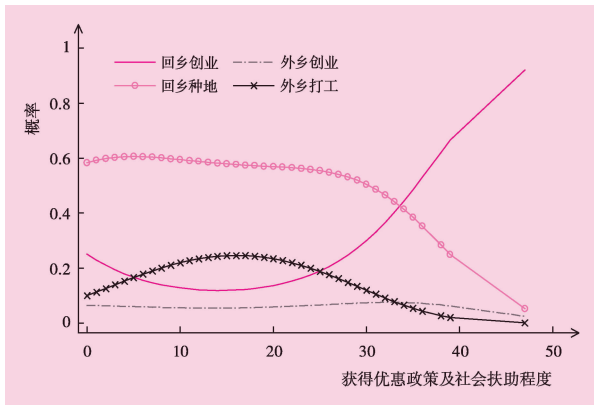


图 2 政策刺激与不同经济行动选择

注:以本文所用的原始数据为基础,使用 Multinomial Logistic 计算结果进行绘图,图形曲线做过平滑处理。

所获得的社会帮助程度对于刺激他们选择返乡创业的可能性都是较低的。这说明优惠政策并没有成为导致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根本因素。从政策效果看,农民工获得的优惠政策及社会扶助等社会帮助程度每增加 1 个单位,回乡种地的发生比下降 8%,即政策扶助对于降低农民工选择回乡种地的概率有显著影响。相对于在外打工而言,选择在外乡创业和回乡创业的概率为先降后升。这说明,从政策结果来看,政府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容易让农民放弃种地,但当政策力度不大时,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效果就不明显。

3. 家庭因素影响下农民工经济行动类型的选择

从表 3 的数据结果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没有孩子的农民工,有孩子的农民工选择回乡创业比选择外出打工高出 2.3($e^{0.866}$, $p < 0.001$)倍,选择外乡创业比其高出 1.97($e^{0.681}$, $p < 0.001$)倍,选择回乡非创业比其高出 1.66($e^{0.508}$, $p < 0.001$)倍。根据图 3 所示,首先从选择打工的角度来看,在 20~40 岁时,由于正处在青壮年期,个体外出打工的动机很高。从“没有孩子—外乡打工”曲线可以看出,如果没有孩子等家庭因素的影响,选择外出打工的概率会更高,而选择在农村种地的概率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降低。相反“有孩子—外乡打工”曲线明显低于“没有孩子—外乡打工”曲线,说明有孩子的个体选择外出打工的概率相对

较低。其次,从选择返乡创业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孩子还是没有孩子,在20岁左右,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均不高,因为这段时间通常是在外打工,处于积累经验的阶段(刘志荣、姜长云,2008),但在30岁左右,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逐渐增高,超过“有孩子—外乡打工”曲线,但依然低于“没有孩子—外乡打工”曲线。就选择返乡创业的这个群体内部进行比较,有孩子的个体始终比没有孩子的个体更加容易选择返乡创业。40岁以后,有孩子的个体选择返乡创业的概率超过没有孩子的个体选择在外乡打工的概率。与此同时,晚年之后,部分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但大部分农民工更加倾向于选择回老家种地。由此可以看出,当家庭因素开始出现时,农民工更容易选择返乡创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选择打工的可能性越来越低,相反他们倾向于选择返乡创业或回老家种地。而这种选择更多的是基于对家庭因素的考量。这再一次证明家庭因素是导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键性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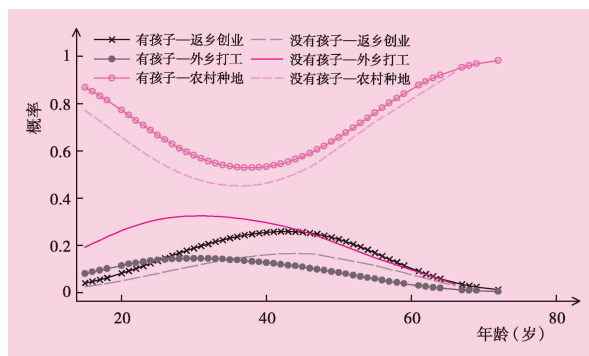


图3 家庭因素影响下随年龄变化不同经济行动选择的概率

注:同图2。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政府扶持政策、经济利益刺激及家庭需求与农民工返乡创业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市场利润”的刺激,还是遇到就业障碍的弱势地位,抑或是优惠政策的吸引和市场因素等对农民工是否选择返乡创业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具体发现如下:(1)年龄、教育等因素对创业行动选择的影响并不是线性的变化。随着年龄的变化,农民工选择创业行动的可能性先提高后降低;同样教育因素也呈现出一种曲线变化,受教育程度处于中等水平的农民工更有可能选择创业,相反完全没有上过学,或者受教育程度为大专以上的农民工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较低。(2)经济收益和地位追求并非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目的,相反家庭因素才是决定中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关键性因素。期望获得更高的市场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的农民工在经济行动的选择过程中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外出打工,而非回乡创业。因此,在理解中国社会现实时,经济收益和社会地位不能作为直接影响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一个核心因素,应该从家庭的角度重新理解农民工在返乡创业过程中经济行动的选择。(3)由于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是基于市场理性的理解,在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往往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和社会扶助的方式来激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然而,本文数据显示,优惠政策和社会扶助对农民工的刺激并非呈线性变化。当社会扶助程度较小的时候,难以刺激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相反会降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可能性,只有当政策扶持力度达到一

定程度时,这种政策优惠的刺激作用才能产生效果。

基于本研究的结果,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从政策制定的对象出发,制定以中年和中等教育水平的农民工为对象的激励政策。本研究发现,中年和中等受教育水平的农民工更容易选择返乡创业。因此,集中力量以这部分农民工的生活习惯作为主要的政策制定依据,推广有针对性的政策有助于在政策推行早期提高政策的效力及节约相应的成本,借用中年人普遍使用的信息传播途径进行宣传,并将政策优惠部分尽量贴近这部分农民工群体的偏好。然后在此基础上拓展到其他年龄段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群体。

第二,从政策制定的内容出发,制定以家庭发展和稳定为核心的促进政策。本研究发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动力来自家庭,因此应考虑以家庭发展与稳定为核心的导向性政策代替以市场利益为出发点的诱导性政策。通过增加与家庭发展和稳定相关的政策,减少农民工在返乡创业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生活危机与家庭风险,进而保障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的经济稳定性与生活持续性。以此提高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情和增加创业动力,而非简单地以市场利益作为诱导性因素。

第三,从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出发,深化政策的实施力度,而非简单完善政策的内容。本研究发现当农民工无法实际享受政策带来的优惠和社会扶助带来的便利时,政策的推行对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并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会降低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的可能性。因此以深化政策的实施力度代替简单地增加政策的涉及面和丰富程度。通过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保护政策的持续性和公平性,从而增强农民工对政策的信任度和依赖程度,加大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刺激效果。

总之,返乡创业是农民工在满足家庭需求的过程中调整经济行动的结果。在经济行动选择过程中,他们重视家庭理性甚于市场理性。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经济行动排斥经济理性,而是兼顾经济理性。返乡创业是替代外出打工和种地活动的经济行动,目的在于平衡市场理性和家庭理性,实质上拉近了劳动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强调社会个体回归生活。

参考文献:

1. 程春庭(2001):《重视“返乡创业”增强县域经济整体发展能力》,《中国农村经济》,第4期。
2. 崔传义(2004):《农村劳动力流动: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载于邓鸿勋、陆百甫主编:《走出二元结构——农民就业创业研究》,中国发展出版社。
3. 村上直树(2010):《中原平原农区回乡创业的现状——对周口市回乡创业者的问卷调查》,《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4. 韩俊(2009):《中国农民工战略问题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
5. 林斐(2001):《对百名“打工”回乡创业农民的问卷调查及综合分析》,《江淮论坛》,第5期。
6. 刘志荣、姜长云(2008):《关于农民创业发展的文献综述——以西部地区农民创业为重点》,《经济研究参考》,第66期。
7. 吴晓刚(2006):《“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社会学研究》,第6期。

8. Barbieri, P. (2001), Self-Employment in Italy: Does Labor Market Rigidity Ma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31(2), 38-69.
9. Bates, T. (1997), *Race, Self-employment, and Upward Mobility: An Illusive American Dream*.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10. Bernhardt, I. (1994),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Self-employment and Paid Work.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27(2), 273-289.
11. Boden, R.J. (1999), Flexible Working Hours, Family Responsibilities, and Female Self-employ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8(1), 71-83.
12. Boyd, R.L. (1991), A Contextual Analysis of Black Self-employment in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1970-1980. *Social Forces*. 70(2), 409-429.
13. Brettell, C.B., & Alstatt, K.E. (2007), The Agency of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Biographies of the Self-employed in Ethnic and Occupational Niches of the Urban Labor Market.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63(3), 383-397.
14. Gerber, T.P. (2001), Paths to Success: Individual and Regional Determinants of Self-employment Entry in Post-Communist Rus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31(2), 3-37.
15. Hanley, E. (2000), Self-employment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 A Refuge from Poverty or Road to Riche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33(3), 379-402.
16. Hinrichs, K. (1990), *Irregular Employment Patterns and the Loose Net of Social Security: Some Findings on the West German Development* (No.24). Minda de Gunzburg Center for Europe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7. Light, I.H. (1972), *Ethnic Enterprise in America: Business and Welfare Among Chinese, Japanese, and Blacks*.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8. Lofstrom, M. (2004), *Labor Market Assimilation and the Self-employment Decision of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pp.191-222
19. Mata, F., & Pendakur, R. (1999), Immigration, Labor Force Integr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Self-employmen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3(2), 378-402.
20. McManus, P.A. (2000), Market, State, and the Quality of New Self-employment Jobs among Men in the U.S. and Western Germany. *Social Forces*. 78(3), 865-905.
21. Quinn, J.F. (1980), 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Patterns of Older Self-employed Workers. 43 *Soc. Sec. Bull.* 17.
22. Robson, M.T., & Wren, C. (1999), Marginal and Average Tax Rates and the Incentive for Self-employment.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65(4), 757-773.
23. Rona-Tas, A. (1994), The First Shall be Last?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st Cadre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1), 40-69.
24. Spener, D., & Bean, F.D. (1999), Self-employment Concentration and Earnings Among Mexican Immigrants in the US. *Social Forces*. 77(3), 1021-1047.
25. Vijverberg, W.P. (1990), Nonfarm Self-employment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in Cote d'Ivoire: A Test of Categorical Identity.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24(4), 523-542.
26. Waldinger, R., Aldrich, H., & Ward, R. (1990), Opportunities, Group Characteristics, and Strategies. *Ethnic Entrepreneurs*. 13-48.

(责任编辑:朱 犁)